

经济特区四十五年建立与发展的国际价值*

袁易明^{1,2}

(1.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0;

2.深圳市汉仑绿色发展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长期以来, 发展中国家“贫困陷阱”被认为是低水平消费与投资恶性循环的结果, 其出路在于以外生投资和消费冲击打破恶性循环。历史事实并没能支持这一主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了三个发展的新逻辑, 即以制度改革建立新经济体制走出旧体制困境、以功能使命动态优化应对阶段性发展挑战、以内生性制度创新驱动发展高效率, 由此实现对发展起飞困境的突破, 成为通过体制创新打破制度锁定低效均衡的先行样板。四十五年来深圳对国际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体现在以经验分享和理论阐释深化国际社会对经济特区的深刻认识, 以辉煌客观成就坚定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起飞路径抉择, 以知识技能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在中国式经济特区已成为众多国家推动经济起飞战略选择的时期, 本文提出了以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引导新兴产业理念, 通过国际创新资源配置力形成“创新极化效应”, 发挥研究机构和智库作用提升中国经济特区模式引领力, 搭建企业“走出去”平台提升深圳贡献度等深化深圳国际价值的路径。

[关键词]深圳经济特区 国际价值 起飞路径 发展逻辑 创新极化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5)05-0017-10

一、引言

数个世纪里, 众多国家都存在于落后窘境状态, 经济社会无法起飞, 长期处于“贫困陷阱”中。因此, 百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探寻能够走上经济起飞与持续发展的道路, 然而实现起飞的却为数不多, 大多数国家仍旧没有能够获得突破。在为数不多获得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 又有大比例的在经过一些发展后停滞不前, 驻足于中低收入水平线, 陷入中等收入发展困境。显然, 能够驱动经济增长起步并能够

持续向前的道路, 对于一个国家和国际社会极为重要, 发展道路的寻找因此是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和行动。

建设经济特区成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探索发展道路历程中的重要实践, 过去50年特别是最近30年, 经济特区道路已经成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战略, 在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都建立过或者正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广泛存在。

收稿日期: 2025-05-14; 修回日期: 2025-06-11

*基金项目: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2024年度临时专项科研项目“新时代以来国际经济特区发展动态研究”(2024AE003)

作者简介: 袁易明,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深圳市汉仑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要从事产业发展与政策、特区经济比较研究。

纵观经济特区建设历史、演进过程,不难发现其具有在数量上稳步提升,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在功能类型上由贸易自由向综合型、专业技术型升级的变化趋势。

全球经济特区建设历经两个五年加速发展期,在此期间,平均每年新增经济特区超400个,两个加速发展期内成立了4272个经济特区,占过去50余年全球建立经济特区总数的56.96%。其中,1997—2002年的5年间,世界经济特区进入第一次爆发增长期,数量从845个增长至3000个,年均增长数量超400个。随后,世界经济特区进入平稳增长阶段,2003—2018年的15年内新增经济特区数量为2383个,平均每年增长约159个。2019年至今世界经济特区进入第二次爆发增长期,5年内经济特区数量从5383个增长至7500个,年均增长数量超400个。^①

经济特区建立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亚洲地区。在亚洲,经济特区主要集中于东亚、东南亚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的经济特区数量分别为2285个、1931个,在数量上为全亚洲贡献了80%的经济特区。^②

从经济特区类型分布上看,综合型经济特区高度集聚于东亚地区,累计1257个,占世界综合型经济特区总量半壁江山(约54%)。专业技术型经济特区高度集聚于东南亚地区,累计958个,占世界专业技术型经济特区总量比重近60%。^③其中,马来西亚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是世界专业技术型经济特区的典型代表,凭借坐落于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三座重要港口之上的优势地理位置,成为全球贸易网络的支点,重点聚焦柔佛州大部分的战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等领域,加快建设边佳兰等重要石化产业中心,形成东南亚规模最大的综合炼油和石化开发设施,主要依托雄厚的资本支撑力量满足企业发展需求获得高速发展。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提供多项优惠政策,如公司所得税减免、投资所得税减免、再投资税赋优惠、进口税、销售税和国产税等。

二、深圳突破起飞困境的逻辑

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低水平消费与投资的恶性循环导致了“贫困的陷阱”。然而,仅从消费与投资视角解释增长困境缺乏说服力。这是因为,外生的投资或消费冲击很容易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长期增长停滞的背后是制度锁定。导致贫困的因素虽多,但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来调整,贫困状态长期得不到改善,意味着制度被锁定于一个低效率状态。被锁定的制度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纳什均衡。因此,如何突破这个低效率均衡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

对于经济特区为何能在国家起飞中起作用,国际上主要存在两种主张。

一是非均衡发展论。Litwack和Qian提出转型经济中特区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转型初期,在特区采取重点投资或财政激励,且促成“非特区”对特区的“汇聚效应”是一种最优决策,这样可以实现资源利用的集中,有效避免“低均衡陷阱”。这种非均衡发展先在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实现,然后形成对中、西部正的“溢出效应”,并逐渐由非均衡转为均衡。这样特区则可以通过减少制度成本和政治束缚,成为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催化剂。^[1]

二是国际大循环论。依据“国际大循环”理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特区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Madani认为,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包括外贸在内的经济全面发展。建立经济特区,则是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始^[2]。

Joseph根据转型国家的经济事实研究得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之外,组织和社会资本对经济转型发展也很重要,这种资本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以及价值观的形成、调节交易和解决争端的各种制度和关系等。由此,可以通过资本和价值观形成、调节交易和解决争端等

①②③数据来源:世界经济特区地图<https://www.openzonemap.com/map>。

途径来完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在规范的竞争环境中健康发展^[3]。Acemoglu等研究了欧洲在1500—1850年的兴起,他们发现在间接或更多直接的制度影响下,大西洋贸易促进了欧洲的发展。在具有通往大西洋的交通基础和初始制度的先决条件下,大西洋贸易体制的变化,如政治体制、产权等等,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4]。

无论是资本引入、政府财政投入、坚定的政府意志、亦或是空间上的增长极建立等等,只能说是经济特区存在的现象逻辑,不是经济特区战略路径的理论原因。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大多长期处于“贫困的陷阱”中,没有能够实现起飞是因为没有解决低水平消费与投资的恶性循环导致的“贫困的陷阱”。因此,仅从消费与投资的视角解释增长困境,严重地缺乏说服力。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长期增长停滞的背后是制度锁定使得外生投资冲击或消费冲击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这就是说,正是制度这一因素而非其它,是造成一国经济锁定于某种低效率状态的缘由,处于贫困状态的发展均衡长期得不到打破。显然,经济特区是打破贫困发展均衡的工具,这当然又是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的。这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经济特区道路的关键。

对于经济特区自身的成功,西方学者从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趋势,提出了多种理论框架来解释,从制度主义、国家角色、全球化嵌入、产业集群和社会动态性五个维度系统解释其原因。

从制度适配与治理创新视角,认为经济特区的成功被视为制度优势的产物,核心不仅在于政策优惠,更在于制度设计与本土环境的适配性。制度嵌套性是指经济特区的制度设计需嵌入国家整体治理框架,避免成为“制度孤岛”。世界银行学者Farole提出,特区政策必须与本土法律体系、行政能力和市场规则兼容^[5]。Phelps于2023年提出特区“监管沙盒”机制,即特区通过“监管沙盒”机制降低制度摩擦,例如迪拜杰

贝阿里自贸区(JAFZA)允许外资100%控股、简化行政审批,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入驻^[6]。

从发展型国家理论视角的战略干预与资源整合解释,国家在特区发展中扮演“战略推手”角色,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和资源整合推动结构转型。包括产业政策精准化策略,即政府通过定向补贴、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投资引导产业升级。新加坡裕廊工业园通过聚焦电子和化工产业,形成全球价值链(GVC)关键节点^[7];创新生态系统策略,即国家角色转向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例如,印度尼西亚巴淡岛数字经济区通过政府主导的数据中心建设和数字人才培养,吸引科技企业;公私合作(PPP)模式创新,即政府与私营部门风险共担机制可缓解融资约束。比如卢旺达基加利经济区通过国际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和本土企业联合投资,降低初期建设成本。

从价值链嵌入理论的价值链升级与区域联动解释,认为经济特区的成功与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定位密切相关,学者提出“双重嵌入”模型,全球价值链(GVC)整合,经济特区通过基础设施(如港口、保税物流)和制度优势(如关税减免)嵌入全球价值链。越南胡志明市电子产业区通过吸引三星、英特尔等企业,实现从组装向研发环节跃升;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嵌入,经济特区需与区域市场协同发展,比如东非共同体(EAC)内的经济特区通过统一关税和交通网络,扩大市场辐射范围^[2]。

从产业集群理论出发的集聚效应与知识溢出解释,认为产业集群是特区成功的微观基础,其机制包括技术外溢、供应链协同和创新网络,包括企业协同与知识扩散,即地理邻近促进隐性知识传播和专业化与多样化平衡。此外还有从社会动态性理论的包容性增长与劳工赋权解释以及空间正义与社区参与等等。

对于经济特区的成就,国外学者的解释认为其具有动态性,也就是对于成功机制的动态性,经济特区的成功并非静态模式,需随技术变革(如数字化转型)和全球秩序(如供应链

重组)动态调整^[8]。例如,传统出口加工区正向“数字创新区”转型,政策重点从税收优惠转向数据流通便利化。经济特区的成功是制度设计、国家战略、全球化嵌入、产业集群与社会包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研究需突破单一学科视角,构建融合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的复合分析框架,同时关注数字技术、气候变化等新变量对成功路径的重塑作用。政策制定者应避免简单复制“最佳实践”,转而探索与本土政治经济生态适配的动态模式。

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制度试验区域,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早期发展中国家建设的经济特区都有本质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设置的特殊经济区域的逻辑原因是侵略性的制度与经济输出。早期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特殊经济区域是以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包括商品输出的市场扩张和资本输出的投资行为扩张,以及伴随发生的制度和文化的扩张)为主要目的,“自由贸易区在历史上早就是侵略性的商业强国的工具”^[9]。

对于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以上理论不具有足够解释力,因为深圳经济特区与早前国际上出现的经济特区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多数发展中国家早期建立经济特区的根本原因是引进资本克服要素稀缺。印度自从1965年建立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以来,经济特区成为印度发展的一个战略选择,2006—2010年5年间新建立了576个经济特区,吸引外来资本280亿美元,直接投资60亿美元。同样,菲律宾经济特区引进投资38.5亿美元,创造6万个劳动就业岗位。1995年越南开启了经济特区的建设道路,对于经济特区带动起飞的模式尤为重视,相继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引入的投资量巨大。近几年波兰的14个经济特区在2005年前就获得64亿美元的外资数量。^①

国际上经济特区偏重物质性(首要任务是

解决要素约束)和局部性(单一功能、激发特区本身发展)。其建立与发展经济特区的逻辑是以规避国际上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从商品贸易自由和生产要素重组产生的比较优势中获取发展驱动力^[10]。因此,这些特定经济区域存在的依据是特殊优惠政策的吸引效应。在理论上,这个政策效应是要素与商品的自由流动对投资与贸易壁垒替代效应的具体表现,当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内容的全球化进程得到深化之后,这一政策吸引效应锐减,经济特区会失去发展的优势,其存在的合理性随之不复存在。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依据在于制度转换能够产生制度替代效应,根本的独特性在于发展过程中拥有率先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优势,经济特区以改革开放战略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障碍,走出了45年前面临的资本不足、市场制约和体制落后等经济起飞的三大制约^[11]。深圳经济特区突破起飞制约具有以下三个逻辑。

(一)以制度改革与实践走出旧体制困境

深圳经济特区始终以制度改革试验为主要使命,始终探索如何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革的任务是通过推进制度演进,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在旧的非均衡制度到新的均衡制度之间创生发展的新动力,由此推进社会与经济发展。制度改革从生产者角度建立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要素的新配置运行体制机制,释放旧体制对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束缚,形成明确的资本、土地、劳动、管理等权利主体,从市场交易制度上看,价格体制改革加上市场交易体系建立,使要素和商品的交易成为可能^[12]。

自建立以来,深圳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探索者与实践者,在中国经济的起飞、快速发展、转型发展三个阶段均进行了卓越的实践,为全国发展做出了制度建设和生产力发展贡献;同时,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①数据来源:印度经济特区官网<https://www.india.gov.in/official-website-special-economic-zones-india>。

这一目标体制率先提供了实践基础,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案例。

在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意义上,深圳通过实践形成制度创新高地,制度创新高地产生制度扩散,通过制度扩散带动其他地区制度创新,这一扩散链条发挥制度创新辐射带动功效。现今,这样的模式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经济特区范式,即以制度改革为推进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先行试验的成功实践辐射推广为基本途径,以改革开放为根本策略,实现共赢发展、共同发展^[13]。

(二)以功能使命动态优化应对阶段发展挑战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的经济特区发展历程里具有由制度试验导向到区域发展导向再到问题发展导向的动态演进特征,在期望功能的设定上由全局性、战略区域性到特定局部性变革的动态演化过程^[14]。由为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建设服务,在空间上具有全局性、在内容上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综合性特区到其任务主要在于培育全国战略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区域发展,形成新空间发展格局的又一代经济特区。此后伴随发展新阶段到来,新的发展约束需要针对性的新策略,经济特区的重要任务是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比如资源环境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等等具有区域局部意义的特定问题解决策略,新一代经济特区由此设立。

显然,从深圳出发的经济特区创立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发展演化过程^[15],即在空间区域选择上,由制度试验导向、区域发展导向转至发展问题导向;在期望功能上由全局性、战略区域性到特定局部性的变化;从本质内涵上,则由制度试验、综合实践向路径探索变化,成为独特的中国式经济特区动态演化特征。

这种动态演化不仅体现了深圳经济特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功能调适,也反映了其应对复杂发展环境的能力提升。早期通过制度突破

释放市场活力,中期依托区域协同推动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而当前则聚焦于以创新驱动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路径。这一演进逻辑表明,深圳经济特区并非静态制度安排,而是持续响应国家发展需求的动态实践机制。面对新发展格局,深圳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不断升级,已由初期的“政策红利”驱动转向“制度创新”引领。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正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强化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索适应高水平开放的治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回应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也契合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

(三)以内生性制度创新创造高效发展效率

基于制度需求和社会文化情景的制度创造过程是内生性制度创新的核心内涵。立足于制度需求和社会文化情景的制度创造,其驱动理由是制度内容不具有完全的普适性。无论是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的发展经济体,都难以提供适宜所有国情和发展需求的现存制度选择。如果只是简单的学习、引进、模仿显然已经难以完成制度创新任务。制度创新更需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自己国情特征的内容,因此经济特区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制度变迁之路。

根据发展需求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无疑能够提升经济运行绩效。不是所有的制度创新都能够带来经济发展效率的改进,不是所有的制度创新努力都能产生有效的制度供给。只有具有正效应的制度变动才具有意义,效应为零甚至为负的制度创新是无效变革,这样的改革浪费社会资源,抬高社会改革成本。制度的变动是以社会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只强调“改”的行为而不注重“改”的效果,无疑会大幅度地降低制度改革的成效。经济特区的“自主性”制度探索强调“创造性”。当然,自主性的制度创新不是排他性的从无到有的制度生产,而是可以借鉴现有的有效体制机制,然后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制度的再

造,形成符合需要的新体制。

就如前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设置经济特区的逻辑原因是侵略性的制度输出与经济输出,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的根本原因是引进资本以解决要素稀缺,偏重物质性和局部性,以规避国际上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从商品贸易自由和生产要素组合比较优势中获取发展动力,则是这些国家设立经济特区的逻辑,其存在的依据是优惠政策的吸引效应。在理论上,此政策效应是经济要素与商品的自由流动对投资与贸易壁垒的替代效应的具体表现,当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内容的全球化进程深化后,这一政策的吸引效应会出现锐减,经济特区就会失去发展优势。显而易见,深圳等中国经济特区开辟出来一个全新模式,其制度性、有效性和模式优化能力形成其广泛国际影响力,经济特区中国模式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经济特区的借鉴样板。

三、深圳对国际经济特区发展的贡献

在发展中国家规划建立经济特区过程中,深圳提供了经济特区经济建设的知识体系样本、制度创新样本、企业培育样本、城市治理样本和生态文明样本。

深圳的“圈出一个地方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经济特区理念,胆识起步、特区规划、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产业引进等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经济特区知识体系,众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学习这一经济特区知识体系。2015年,坦桑尼亚建立巴加莫约经济特区,时任出口加工区管理局促进和便利化部主管表示巴加莫约经济特区正在“复制”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模式建设^[16]。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参照深圳模式为本国和外国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者在不同领域开发项目创造税收优惠空间,第一阶段首先建设在帕拉瓜纳半岛、阿拉瓜、拉托尔图加岛和拉瓜伊拉4个重点区域。

2023年,沙特以深圳为典型案例在沙特境内设立4个经济特区,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17]。2024年,新马两国联手打造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柔佛州务大臣哈菲兹率团来到深圳“取经”,并在州议会表示“相信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帮助下,柔佛可以成为东南亚的深圳”^[18]。

为众多国家提供经济特区建设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经济特区研究咨询机构和社会智库参与越南、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印度、斯里兰卡、刚果(布)、巴基斯坦、科特迪瓦、科威特、阿联酋、白俄罗斯、南太平洋岛国等多个国家经济特区规划,提供“园区咨询、工程建设、融资安排、资源开发、招商引资”等研究制定,通过经济特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为经济特区提出现实解决方案。

以经验分享和理论阐释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深刻认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经济特区发展论坛”和《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等着眼于全球经济特区的建设历程与演化规律,开展多类型经济特区发展比较,总结中国经济特区模式与经验、对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借鉴价值,吸引中、美、日、韩、印、泰、越等国学术机构、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专家,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特区发展的国际化阵地。

以辉煌的客观成就坚定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起飞的路径抉择。例如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委内瑞拉、苏里南、突尼斯、秘鲁、津巴布韦、加纳、利比里亚等十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访问深圳后对经济特区发展的高度赞许,阿尔及利亚总统多次参观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惊讶,委内瑞拉总统在深圳见证《关于经济特区合作、发展和现代化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署等。

以知识和技能提升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数以千计的来自东南亚国家负责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官员、机构代表

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在深圳参加专题考察培训,交流经济特区设计规划、招商引资、产业集聚、人才配套的经验。同样,围绕经济特区发展,在古巴哈瓦那当地为马列尔经济特区官员开展培训,内容涵盖经济特区的发展思路、法律法规、区域规划、投融资研究、管理运营等,这样的事件不止在深圳、在国内其他经济特区每天也都在发生。

以企业“走出去”导向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理念。深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标杆城市,其经济模式与全球化经验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范本。近年来,深圳经济特区加速向海外经济特区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投资与产业引导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形成了“创新研发+高端制造+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复合能力。例如,华为在全球设立16个研发中心的同时,通过海外工业园(埃及通信产业园)输出5G技术标准;比亚迪在匈牙利建设新能源车工厂,带动当地电池产业链发展。

深圳企业海外投资呈现“区域差异化+产业精准匹配”特征。在越南海防的深越海防经济合作区已吸引32家企业入驻,形成手机配件产业集群;在泰国罗勇等地建设智能硬件产业园,承接消费电子产业链转移,形成东南亚制造业枢纽;在非洲,依托传音控股在埃塞俄比亚的智能工厂,带动移动支付、数据中心等数字基建投资,以“深圳-东莞”的“硬件+服务”模式建设非洲数字化跳板;在中东,结合当地能源转型需求,在沙特NEOM新城布局光伏储能项目,实现新能源技术输出与石油资本对接构建绿色经济合作。

深圳通过本地产业升级与海外投资合作形成协同效应,已经出现深圳开展合作的三个创新机制。

其一,供应链赋能体系。通过供应链管理企业搭建跨境服务平台,帮助海外园区企业接入全球采购网络,比如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深圳供应链中心”已降低当地企业30%的物流成本。

其二,技术标准输出。在数字经济领域,深圳企业主导编制了IEEE智慧城市、无人机空管等12项国际标准,使海外园区成为技术扩散节点,如肯尼亚蒙巴萨智慧港采用华为智慧物流系统后,货物周转效率提升40%。

其三,创新生态复制。将“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创投”模式移植至海外,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深以创新中心”已孵化数十家人工智能企业,形成跨境技术转化通道。深圳对海外经济特区的投资,本质是将中国市场化改革经验与全球产业变革需求相结合,其产业引导模式既不同于西方跨国公司的资本垄断,也区别于传统基建援助,而是通过技术协同、生态共建实现互利共赢。

四、深圳经济特区国际价值的深化路径

在世界变局快速演化背景下,提升深圳经济特区国际价值受三方面制约,包括技术适配度制约、制度兼容性制约和地缘博弈挑战。克服技术适配度制约需要匹配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克服制度兼容性制约需要规避法治环境、劳动用工文化等对管理模式移植效果的影响,克服地缘博弈挑战需要有效应对可能割裂技术合作网络的风险。由此,深圳经济特区国际价值的深化策略在于建立“技术-制度-价值链”三位一体的深化框架,以持续释放外溢效应,持续提升深圳在全球经济特区的影响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辉煌。

(一)通过国际创新资源配置力形成“创新极化效应”

对于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国家要求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深圳在历经科技园区内特定范围创新、城市全域拓展创新、国内资源配置创新之后,需要走向“国际创新要素为我所用”的全球创新资源整合发展阶段,以充分运用国内科技市场和国际科技市场、国内创

新要素和国际创新要素,有效实现颠覆式技术创新的研发、应用与拓展,这是能实现全球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战略目标的路径逻辑。

提升深圳国际创新资源配置力,既是国家战略落地的关键行动,也是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重要支点,其意义已超越深圳单一城市能级跃升。从国家维度看,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创新资源配置力的强化是突破“卡脖子”技术封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突围。从全球南方视角观之,深圳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依附性创新”路径选择。不同于传统“中心-边缘”体系下技术单向转移,深圳通过“技术协同+本地化适配”模式,创造“科技普惠”新范式。

更深层次看,国际创新资源配置力的提升催生“创新地理革命”——深圳-东莞-惠州创新走廊贡献珠三角72%的研发投入,深港联合资助项目年均增长35%,这种跨制度边界的要素重组,正在构建多极化、多中心的创新网络。有研究得出,深圳配置的国际研发资源每增加1%,可带动大湾区GDP提升0.6个百分点,技术外溢效应辐射至东南亚制造业的强度达0.43,当深圳将资源配置力转化为全球技术市场的“定价权”、创新规则的“定义权”、文明对话的“叙事权”,其意义已不仅在于培育若干世界级企业,更在于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形态的创新生产力,这为人类破解“技术鸿沟”“发展陷阱”等世纪难题提供了历史性答案。

(二) 发挥研究机构和智库作用提升经济特区中国模式引领力

中国经济特区模式的国际化绝非简单经验复制,而是文明对话语境下的发展知识再生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以历史自觉担当“解码者”“转译者”“赋能者”三重角色,将特区实践中蕴含的“改革智慧”“创新哲学”“治理伦理”转化为具有一般性价值的共同财富。这需要构建更开放的研究生态——既扎根中国实践提炼理论结晶,又以全球视野解构西方话

语霸权;既保持战略定力坚守价值内核,又创新方法论工具增强模式弹性。当深圳模式通过智库转化为非洲自贸区的实操手册,当浦东的金融开放经验的学术诠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参考方案,中国经济特区模式便真正实现了从“中国样板”到“世界方案”的质变,为人类探索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点亮明灯。

在全球化深度重构、国际秩序加速变革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模式面临从“政策试验田”向“制度输出源”转型的历史任务。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亟需发挥战略谋划、知识转化、国际对话等核心功能,将特区经验升华为可复制、可适配、可持续的国际性公共知识,破解西方中心主义发展话语的垄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注入中国智慧。

智库赋能特区模式国际战略价值,其根本任务在于研究阐述经济特区四十五年的实践蕴藏着丰富的制度创新密码,通过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克服“实践先行、理论滞后”制约国际传播效能。围绕提炼制度创新内核、量化发展绩效、比较优势重构推进深圳等中国经济特区研究深化。

(三) 搭建企业“走出去”平台,提升深圳国际贡献度

“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深化国家间、地域间的商品、资金、技术以及人员上的流通,扩大了国际利益交汇点,为全球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开拓新的增长空间。深圳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城市,依托“双区”优势,利用“一带一路”机遇,推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展会和跨境电子商务等高质量发展,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特区建设,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搭建更多双向投资平台,健全投资合作机制,构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提升深圳经济特区在“一带一路”经济特区建设中的参与度。

搭建“一带一路”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发布“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包括市场动态、政策法规、安全管理、税收规则、经贸合作等内容,为企业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指引。一方面,建立投资项目信息库,发布“一带一路”投资意向,按期制定投洽会重点融资项目库、招商引资项目库、对外投资项目库,鼓励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举办知识产权风险防范与海外维权培训,为深圳企业在海外市场开拓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提供指导帮助。

(四) 组构经济特区技术共同体建设国际创新资源配置机制

深圳历经“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再向“跟跑并跑”的自主创新发展区升级转变,势必走向“并跑领跑”的自由科技创新颠覆式蝶变阶段。现阶段,深圳经济特区创新发展的制度要素、人才要素、资金要素、技术要素及数据要素仍需进一步优化,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行颠覆式创新,实现“0-1”的前沿科技突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组构经济特区技术共同体,深圳与国际上的经济特区构成多方友好城市共同创新联盟,组构“科技创新共同体”。其中与科创实力强的国际友好城市重点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大数据、物联网、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强合作,与科技创新起步阶段城市重点推动现代物流、会展旅游、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全网布局;与中东欧国家国际友好城市围绕国际产能、基础设施、合作园区等领域开展合作。

深圳经济特区几十年探索的模式与成就充分表明,从“三来一补”开启的工业化到“硬核科技”的产业跃迁,从“世界工厂”到“创新策源地”的动能转换,一直保持战略耐性与创新锐气,其服务国际的能力在快速成长,输出智慧城市、绿色基建方案、国际PCT专利申请量连

续居全国首位等等,但这些也仅仅是深圳模式的外在体现,真正的国际价值在于深圳制度改革创新的特区方法论,经济特区深圳方法论,不仅诠释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还为国际经济特区发展提供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LITWACK J M, QIAN Y. Balanced or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pecial Economic Zone as catalysts for transition[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8, 26(1): 117-141.
- [2]MADANI D. A review of the role and impact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9, 17(2): 33-37.
- [3]FEWSMITH J. Institutions, informal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hina[J]. Asian Survey, 1996, 36(3): 230-245.
- [4]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3): 546-579.
- [5]FAROLE T, AKINCI G.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ogress, emerging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1: 93-112.
- [6]PHELPS K.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Asian SEZs[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23: 56-72.
- [7]YEUNG H W. Strategic coupling: East Asi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M].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22.
- [8]袁易明. 中国经济特区的动态演化与实践使命[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5(4): 46-50.
- [9]苏东斌. 中国经济特区的三大历史性贡献[J].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 2009(1): 7-9.
- [10]樊纲. 中国经济特区的独特价值与作用——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角度[J].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 2011(1): 3-12, 133-146.
- [11]罗海平. 世界经济特区的建设与发展[M]//袁易明, 陶一桃.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12).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401-415.
- [12]师春苗.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经济特区向中央要权纪实[J]. 红广角, 2010(9): 20-23.
- [13]袁易明. 中国经济特区产业发展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27(4): 21-25.

- [14]袁易明,姬超.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转型路径——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J].经济学动态,2014(10):75-86.
- [15]袁易明.中国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的三大制度贡献[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5(4):31-36.
- [16]坦桑尼亚建经济特区 百分之百复制深圳模式[R/OL].(2015-03-31)[2025-05-13].https://finance.ifeng.com/a/20150331/13596988_0.shtml.
- [17]委内瑞拉正借鉴中国深圳模式[R/OL].(2024-06-03)[2025-05-13].https://www.sohu.com/a/783346438_114911.
- [18]想复刻中国成功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联手打造“东南亚深圳”[R/OL].(2024-08-22)[2025-05-13].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4_08_22_745665.shtml.

【责任编辑 袁竑源】

The International Value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 for 45 Years

YUAN Yiming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poverty tra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result of a vicious circle of low-level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and the way out is to break the vicious circle by exogenous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shocks. Historical facts don’t support this proposition.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has established three new logics for development, that is, to establish a new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get out of the old institutional dilemma, to dynamically optimize the functional mission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phased development, and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efficiency with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se efforts enable Shenzhen to realiz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development take-off dilemma and become the pioneering model to break the inefficient balance of the system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past 45 years, Shenzhe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hich is reflected in deepe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ith experience sharing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hoice of economic take-off path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brilliant objective achievements, and hel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talent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period when Chinese patter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have become a strategic choice for many countries to promote economic take-off,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guiding emerging industries with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foreign investment, forming an “innovation polarization effect” through the alloc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ink tanks to enhance the leading force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 model, and building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platform to enhance Shenzhen’s contribution to deepen Shenzhen’s international value.

Keywords: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ternational value; take-off path; development logic mechanism; innovation polarization effect